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加〕威廉·莱斯 著

岳长龄 李建华 译

自然的控制

YANJIU CONGSHU



重庆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1 8695 3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重庆出版社

自然的控制

1905



YANJUCONGSHU
YANJUCONGSHU
YANJUCONGSHU

(川) 新登字010号

William Leiss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根据灯塔出版社1974年英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 徐国金
封面设计 王晓珊
技术设计 刘忠凤

[加拿大]威廉·莱斯著 岳长岭 李建华 译

自然的控制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25 插页4 字数162千
1993年5月第一版 1993年5月第一版第次印刷
印数: 000—3,000

*

ISBN 7-5366-2095-0/B·52

定价: 3.95元

在研究当代各种思潮中 发展马克思主义

——为《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出版而作

徐崇温

党的十三大指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学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从建设到改革的发展，“都是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扩展和深化，都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各国实践和时代发展的结合”；指出“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

要适应这样的大趋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就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就是说，必须在积极探索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中的新问题，探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规律的同时，研究当代世界的新变化，研究当代各种思潮，批判地吸取和概括各门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必须在研究实践的同时，还要研究当代各种思潮？

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过去，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赢得世界历史性的意义，

就是因为它是在吸取和改造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形成起来的，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思想、新的理论、新的观念的时候，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吸取和改造其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就显然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即使是资产阶级思潮，尽管它们大多以现代唯心主义的歪曲形式出现，却毕竟在这种形式下，提出了一系列真正由实践产生的问题，一些实际的、迫切的科学问题。把这些问题当作正面考察的对象，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从中引出应有的结论，可以使马克思主义紧紧把握时代和实践的脉搏，从新的实践中吸取思想营养。

在一场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现时代，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研究当代各种思潮尤其具有迫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新的技术革命使得全球问题日益尖锐化，把人类生存的利益提到极其突出的地位，要求人们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以正确对待和解决这些问题。十分明显，必须深入研究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当代各种思潮，我们才能跟上时代和实践的足迹，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

而在当代各种思潮的研究中，对于那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考察，对于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宏伟事业来说，又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是因为这些思潮、流派都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为研究对象，二是因为它们又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以不同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去进行这种研究的，课题的同一性和观点的多样性相统一，这就使这种考察可以更加直接地有助于我们在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

神，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并结合亿万人民的实践，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以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为例，长时期以来，人们对这个问题一直进行着热烈的讨论：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只按自己的规律运转、而同人的实践没有干系的体系，认为马克思在哲学领域中实现的革命变革是把实践引进了认识论，把人对客观世界的改变，看成是认识的基础；而“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则认为，世界是通过主体而得到中介的，因而，在马克思那里，不是物质的抽象，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性，才是唯物主义理论的真正对象和基础。

在这些不同思潮的撞击中去研究和把握马克思著作的精神，我们便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具有两个基本点：一方面，是把实践引进了本体论，强调也要从主观方面去理解事物，即把事物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强调人类连续不断的感性活动，是现存感性世界的深刻基础；另一方面，则是始终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始终坚持劳动实践在多种层次上所受的自然制约性。

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联结、不可分割的。然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强调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即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却忽略了它的第一个基本点，即从主观方面把事物当作实践去理解，这就很难同旧唯物主义完全划清界限，这种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充其量只是一种片面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之，“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流派虽然突出了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第一个基本点，却又忽略乃至否定了它的第二个基本点，所以，尽管它们再三声称要纠正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缺陷，但在实际上，却

只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了一个和苏联模式方向相反的歪曲，这样那样地陷入了唯心主义。

所以，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各派的哲学，它们都没有从上述两个基本点的联结上去把握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对马克思主义的附加成分，我们必须从中引出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恢复马克思哲学世界观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去理解其深刻含意，把它推向前进。

《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就是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编辑出版的。

就这套丛书的覆盖面来说，它既包括东方的，又包括西方的，但鉴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西方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了解得较少，所以，在选材方面将以西方的研究为主。邓小平同志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 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 有益 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 动 和腐朽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154页）

就这套丛书的品种来说，既有对国外学者原著的翻译，又有我国学者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潮、流派的研究和评述。但长期以来，我国读者接触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的原始材料太少，因此，这套丛书将以翻译国外原著为主，随着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研究的广泛展开和逐步深入，而逐渐增加我国学者研究专著的比重。

这套丛书的编选，力求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将根据这套丛书的指导思想，挑选一定的翻译和写作书目，组织合适的译者和作者去完成以后分期分批出版。另一方面，我们又竭诚欢迎大家向我们推荐有关的书目、选题，包括推荐译者和作者。还竭诚欢迎大家对丛书中已经出版的作品提出批评和意见。

希望通过这些办法，把这套丛书真正办成一套比较能够反映我国广大读者的需要和要求，在全党全国建设一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在实践中学习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任务中，发挥一点促进作用的丛书。

中 译 者 序

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增强了人类影响自然的能力，它已成为一种堪与自然相匹敌的强大力量。但这种强大力量在运用不当和失掉控制的情况下造成了不良后果，引起一系列影响人和人的未来的极其复杂的社会问题，产生由高生产、高消费所触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生态危机。所以，从60年代末以来，生态运动被逐渐推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运动的最前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力图把生态学运动纳入自己的视野，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结合起来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自然的控制》这本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

本书作者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是法兰克福学派著名代表马尔库塞的弟子。他在美国圣地亚哥大学获博士学位，从1968年起一直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约克大学环境研究所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著作主要是研究与环境和生态问题有关的哲学、社会学问题，并把它与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结合起来。他曾在《哲学论坛》、《国际社会科学期刊》、《目的》、《加拿大公共管理》等期刊上发表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自然的控制》(1972年)和《满足的极限》(1978年)是他的代表作。

本书对“控制自然”这一重要观念的历史、哲学和社会意义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它揭示了这一观念的内在矛盾。阐明环境问题是一种更深刻的困境——人对人的控制的征兆。控制自然与控制人这两方面在其全部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内在的逻辑的联系，控制的真正对象是人。自然主义的崇拜自然和工业主义的征服自然观念都应加以扬弃。控制自然应重新解释为对人类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控制。

一、控制自然的观念是生态 危机的最深层的根源

著者在序言和第一章中鲜明地提出“控制自然”观念是环境问题最深刻的根源，并清楚地展开了这个观念的内涵及研究它的基本思路。

莱斯批评目前在理解环境问题上的两种肤浅倾向。一种是官方机构把解决环境问题仅仅看作一个经济代价核算问题，把环境质量看作是一种在价格合适时可以购得的商品。这种看法仍囿于传统的行为规范框架内，即对工业技术革新能力的崇拜和市场取向的标准。这种思路没有触及问题的根源而且只能继续掩盖这种根源。另一种倾向是认为科学和技术是可诅咒的偶像，对这些假神的顶礼膜拜是灾害的根源，作为一种感情的发泄而提倡诗意的神秘主义或东方宗教方式。莱斯认为这种观点也是错把征兆当作根源。环境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现代科学仅仅是控制自然这一更大谋划的工具。因此，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才是环境问题的最深刻的根源。只有深入理解了这一根源才能找到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

莱斯指出，控制自然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进步性也是退步性的根源。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后者作为前者的后果是怎样产生的，这是我们要解答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人类控制自然观念的主要功用之一（即它作为一种重大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是阻碍对人际关系中新发展的控制形式的觉悟。本书企图论证的基本假设就是控制的这两个方面在其全部历史发展中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

基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行为的最根本的不合理的目标就是，把全部自然（包括人的自然）作为满足人的不可满足的欲望的材料来加以理解和占用。这一目标变成了强制性的、盲目重复的，并将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生产机构无限地扩张就是它的信条，而评价它的成果对于人的价值的一切合理标准却遭到破坏。在这一目标所达到的最后阶段，为生产可以提供的唯一理由是，许多人可以被引导相信他们真的要求和需要市场供应最新商品；在这个阶段，对自然和人的控制在社会统治阶级的引导下内化为个人心理过程；它是自我毁灭的，因为消费和行为的强制性特征破坏了人的自由，并且否定了人类从外部强制中获得解放的漫长而艰难的努力。

二、历史的洞察

莱斯主张，为了揭示控制自然观念的内在矛盾，必须探究它的历史根源和演变。他从有关控制自然的大量历史文献中概括出一个简单的命题：非理性的机巧是在一种长期的错觉（即控制自然的事业本身是被控制的）中被揭示的。这就是说，历史不仅被理性的机巧所驱使，同时也被非理性的机巧所驱使，

科技的理性主义落入了社会矛盾的非理性的罗网。

1. 莱斯首先把控制自然观念内在矛盾追溯到古代神话传说、宗教世界观和文艺复兴时的炼金术士的观点。

莱斯谈到，在古代文化中，伴随着冶金操作形式的象征仪式，就开始表现出人和自然积极合作的观点。在使用工具中产生的优越于自然的态度和在人类活动中感到的独立性和力量，因这些工具是“恶魔”的周期性恐惧感并列而行。这表明，除了现代技术无可怀疑的优越理性之外，无论是前工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工具和程序都没有失去其巫术的光环。它所唤起的潜在的恐惧有一部分是来自一种模糊的意识，即显然没有一个人真正“控制了”为控制自然而发明的那些日益复杂的工具。

与古代世界的泛灵论的崇拜自然的态度不同，犹太—基督教保持着“精神”与自然相分离并且从外部统治它的思想。在《圣经·创世纪》中，上帝进行创造的故事宣布了上帝对宇宙的统治权以及人对地球上具有生命的创造物的派生统治权。《圣经》的说法强调了具有以统治权为基础的绝对权力。正是这个权力因素把人从其他被制造的东西中分离出来。于是人立于自然之外并且公开地行使一种对自然界统治权的思想就成了统治西方文明伦理意识的一个突出特征。对于控制自然的思想来说，没有比这更为重要的根源了。

然而在基督教思想中还有另一种意蕴，即我们周围的自然界有一种与其作为人类活动物质基础的功能完全无关的意义：它是神的创造因而是神圣的。自然有两面性，从它的直接表现来说，作为满足人类维持生命需要的来源，它必然产生功利主义的行为方式；但是另一面，自然则表现为上帝恩赐的可见证据，从价值的观点来看，它应当视为一种理解神的意图的辅助

手段。基督教的教义是通过限制人掌握更高的权力的方法来遏制人的现世的野心。

文艺复兴是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重要根源。这个观念的各种因素都可以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巫术理论中找到，在炼金术、宇宙学、占星术中，甚至在马基雅弗里关于在政治生活中“控制命运”的格言中都能找到。炼金术是科学时代的曙光。征服世界意志的精神根源在炼金术文献中是最明显的，它在事实上已预料到什么是现代世界意识形态的基础。

2. 莱斯着力分析了弗兰西斯·培根对于现代控制自然观念的贡献。控制自然的思想是培根哲学的最基本的要素。他的伟大成就在于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地阐述了人类控制自然的观念，并且在现代人的心目中确立了它的突出地位。然而培根控制自然的观念还深深地沉浸在宗教的氛围中。在培根看来，宗教和科学进行着一种共同的努力，即补偿被逐出伊甸园所受到的伤害：“人由于堕落而同时失去了清白和对创造物的统治。不过所失去的这两方面在此生中都可能部分地恢复，前者靠宗教和信仰，后者靠技术和科学。”宗教的参考框架提供了一种担保，即技术和科学的发展在本质上不会形成无控制的混乱。宗教是知识使用中道德约束的主要根源。

3. 在17世纪以后的哲学发展中，控制自然的观念明确地获得了其现代的形式，一种保持权威性而至今稳固不变的形式。自然科学逐渐与炼金术、巫术、占星术区别开来，科学和技术的相互渗透日益加强。精密科学与控制自然的期望越来越紧密地统一起来，它的发展最终将达到没有任何离开科学技术的其他控制自然方法的状况。通过科学和技术征服自然的观念，在17世纪以后日益成为一种不证自明的东西。因此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对“控制自然”的观念做进一步的分析。这

意味着这个短语已经僵化了，就是说，在广泛公认的范围中只是无休止地重复其优点。

莱斯用了相当的篇幅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和自然关系的思想，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有关控制自然的复杂问题上提出了最为深刻的见解。马克思说过，在劳动过程只是一个单纯的人与自然间交互作用的过程的限度内，它的简单要素，在所有社会发展形式中是共同的。但是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生产资料的发展及其社会形式”之间最终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终于导致改变劳动过程具体特点的新制度的建立。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为了满足需求同自然斗争，但他们的斗争是在一种特定的方式下，即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这与其他的生产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在现实中，从控制自然中获得物质利益的分配总是不公平的。无论人类控制自然达到什么程度，某种社会阶级分化的内部冲突都使得人们的生产系统（控制自然是它的一部分）不可能处于它们的控制之下。这种可能只能出现在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中。马克思说过，自由的实现在于“社会化的个人，相互联合的生产者合理地安排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使它处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允许盲目的力量来左右他们”。恩格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将第一次成为“自然的真正主人，并因此成为自己社会化过程的主人”。莱斯说，这些论述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社会研究的结论，是对控制自然观念的复杂问题提出的最为深刻的见解。但莱斯又认为，后来的历史发展并未发生他们所预示的重大转变。这样讲并不是贬低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成就。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法预料在理性的控制下引起人与自然物质转换的某种全球统一社会秩序形成的可能结构。他们无法预料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已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残酷斗争的重要工具，或者说社会

主义内部的社会化过程因来自资本主义的强大军事和意识形态压力的影响而被扭曲。

莱斯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和内聚力，因为它能够使人与自然的不同的关系与一种社会变化的理论结合起来。他表明控制自然不是个别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因为一来他期望无产阶级的一般社会意识会与对自然的控制同时发展起来；二来技术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后来产生的虚假意识——一种持久地掩盖不公正和阶级冲突的重要方法——的根源。自马克思的研究之后，技术和阶级意识的状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样，他的理论就不得不进行补充和修正，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重新评价控制自然。

莱斯还谈到在资产阶级哲学传统中，19世纪以来还有从赫德和哥德直到后期谢林的自然哲学传统，它致力于形成一个能把自然科学与伦理学、美学结合起来的自然概念，其主要倾向是努力改变把自然只是看作人的统治对象的态度。19世纪中期以后人们对自然哲学的兴趣很快低落了。此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再也无人郑重地向控制自然的观念挑战，控制自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科学。科学的每一成功都被就事论事地看作是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念。

三、控制自然同科学技术和 社会进步的关系

莱斯在本书的第二篇中，根据20世纪三个哲学家的有关思想，集中对控制自然、科学技术及社会进步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这三个哲学家的有关思想分别是：

马克斯·舍勒的科学是“控制学”(Herrschaftswissen),即“为了控制的知识”的思想。

胡塞尔现象学中关于科学的自然和生活世界的自然的区分。

马克斯·霍克海默尔及其合作者的社会批判理论。

1. 科学与控制自然

几个世纪以来形成一种观念：人征服自然是通过科学技术手段实现的，人控制自然的特殊目标就是控制环境。莱斯认为这个论题掩盖了人控制自然的全部意图，因为它掩盖了一系列基本的社会矛盾。莱斯指出马克斯·舍勒对科学和控制自然之间的联系作了精辟的论述，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原始资料。

舍勒认为近代科学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控制学”即关于控制的知识。它与古代自然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不同，是量的范畴优于质的范畴，关系范畴优于实体和属性范畴。科学知识是理解的一种类型，它排除了价值判断。科学知识对象本身在价值上必然是中立的。在舍勒看来，这是把现代科学理解为控制学的最高可能发展的关键：“把世界设想为价值中立的，这是人为了一种价值而为自己确定的任务，这种价值就是主宰和支配事物的生命价值。”现代思想的伟大发现之一是悖论式的，即这一首要的价值能够最好地由把世界看作完全是价值中立的观点来实现。就是说，事物的全部构成都可能为了人的使用目的而加以改造。它贬低所有那些对人支配物没有帮助的东西（终极原因、美学价值等）。同时它坚持优先认识自然现象中那些适合预言和控制意图的方面。

莱斯指出，在舍勒关于科学对世界的控制是一项实用事业的观点中的错误，是没有对人的目标和目的范围进行分析。只

说明对自然的科学研究及其技术应用是发生在一种操作性的结构内还是不够的。关键的问题是，在何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中它是操作性的？如果背景是世界范围的社会集团之间的斗争，那么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激烈的社会冲突就同科学技术进步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每一方都迫使其他方面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在追求控制自然的意志中反映出来的目标，不是各种目标和目的的简单集合，而是包含着相互矛盾的成分。舍勒的基本错误是只研究整体对强力的追求，而没有进一步分析它们相互冲突的成分，而后者恰恰是理解追求控制的历史动力的关键。他没有看到控制自然作为科学和哲学转变的表现和控制自然作为与现代时期的社会冲突结构有关的现象，这两者不是同一的。期望科学方法论本身的合理性原封不动地被转移到社会过程中去，并通过加强开发自然资源满足人的需要来缓和社会冲突，这是错误的。

莱斯进一步指出，舍勒认为把现代科学的目的描述为构造理论的和实践的计划，使人能够榨取自然资源来满足人自身的欲求，这项计划的成功就表现了对自然的控制。但是如果实行这项计划产生了明显的不良后果，诸如生态遭破坏和生物灭绝以及核毁灭的威胁，那么这些也应看作是控制的含义吗？抽象地考查，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好像本身就代表了对自然的更高程度的控制，但是如果它们的合乎需要的和不合乎需要的特点像它在现实中那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控制自然的性质就变得相当含糊了。这种含糊性没有反映在舍勒的控制学概念中，因此他对科学和控制之间关系的说明，虽然很有启发，但却是不恰当的。

莱斯在剖析舍勒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阐述了“控制自然”中控制的本性，指出“控制”“权力”和“征服”这些概念在运